

# 时代的回声

子冈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I217.2  
153

2

# 时代的回声

子 冈 著

黄 伊 选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79626

责任编辑：王 峣  
封面设计：曹辛之

时代的回声  
Shidai De Huisheng  
子 冈 著

---

黑 龙 江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 号)

黑 龙 江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黑 龙 江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印张 8 2/16·插页 3·字数 186,000  
1984 年 7 月第 1 版 198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1,800

---

统一书号：10093·627 定价：1.00 元

---



作 者 像

## 内 容 简 介

彭子冈是我国著名女记者、女作家。这本选集共收入她的通讯、特写、游记、散文、短篇小说等四十九篇文章。由于子冈“笔锋常带感情”，这些文章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读起来引人入胜，爱不释手。她用锋利的笔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残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苦难的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觉醒和高昂的战斗精神。建国以后，她以更为强烈的感情，歌颂五十年代前期朝气蓬勃的国家建设，讴歌周总理领导下的外事活动。最近几年，她久困病榻，仍然战斗不息，由她口授，儿子徐城北为她代笔，陆续发表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阅读这些文章，可以看到中国革命的历史侧面，丰富读者的知识领域，培养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

# 目

- 人间重晚晴 ..... 沈从文(1)  
——《时代的回声》序  
跋《时代的回声》 ..... 李 庚(4)

# 录

## 通讯·特写

烟火中的汉阳	13
扑灭现代刽子手!	15
擦鞋难童献金救国	17
新中国的少年们	20
儿童歌咏会素描	23
欢迎日本反战同盟	25
重庆的米和煤	27
重庆新春	31
薄雾重庆	35
晚秋杂写	39
蒋鉴女士	42
堂姊史良会见记	49
回到了汉口	54
毛泽东先生到重庆	58
重庆四十四日的毛泽东	60
愁城记	62
如是我闻	66

北平小事	70
北平传奇	74
烽火北平	76
北平的春天	80
北平岁寒图	83
北平二三事	86
悲剧中人的断肠语	89
张家口漫步	90
官厅少年	101
官厅水库的春天	108
老邮工	115
盲人·共产党员·模范工作者	123
回忆白玉霜母女	129
忆邹韬奋	132

## 游记 散文

猫与鼠	137
天堂散记	139
三月的巨浪	144
回到重庆	150
伊宁所见	158
访列宁故居	166
寄赫尔辛基	171
我们在迈索尔的时候	178
人之初	183
葵花子	185
汽笛	187

僵局	189
鞭炮响了	192
乡愁	194
短篇小说	
疯狂的人	201
老孙的转变	210
儿子的生日	220
惆怅	235
编后记	黄伊(248)

# 人间重晚晴

——《时代的回声》序

沈从文

前不久，我在去年第四期《大地》上，看到萧离同志一篇题名《宝刀不老》的文章，副标题是“子冈几篇短文读后感”。文字不多，内容却斑驳陆离。文中提及四十年来几个相熟新闻记者的工作、生活及遭遇种种，和我去年在《文汇增刊》上见到子冈所写《熙修和我》一文，内容相似而不尽同。子冈文章提到在满布国民党便衣特务、日机狂轰滥炸四十年代的重庆，她同浦熙修并肩采访，分别写稿，共同在一条战线上作战和生活；写浦熙修抗战胜利后在南京遭特务毒打，被捕入狱，斗争得非常坚强种种。她们在那样艰险复杂的环境下坚持工作、坚持斗争近十年，直到迎来了全国解放。国家看到了前途，民族有了希望，那些充满乐观振奋人心的岁月，谁不欢欣鼓舞！凡是热爱这个备受压迫、多难多灾国家的知识分子，不论新旧，莫不感到有必要投身革命，发挥所长，紧贴国家需要，努力完成建设新国家的任务。多少年的理想实现了，这一对新闻界姐妹更是欢欣鼓舞，为适应新形势，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她们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准备献身革命。万万没有想到几年以后，两人竟一同裹入一场倏忽而来的大风暴旋涡中，无从自拔。风暴信息时断时续，直到一九六六年，

愈来愈猛烈，席卷全国，即使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老帅、大将，都措手不及，未能幸免，形成了史无前例的“十年内乱”。知识分子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下，几乎全被“横扫”。一些拿笔杆子写写文章的，在这场风风雨雨中，被批斗得颠三倒四，无所适从，一直延续了十年。死的默默死去，偶然幸存的，也都由青春华年进入身心憔悴衰老迟暮之中。

几个幸运活下来的同行故旧，尽管在这份长长岁月里，和社会一切近于完全隔绝，耗尽了一生精力最最旺盛的一段生命！由于对国家的热爱、对今后发展前途的关心，始终还不失去生存的信心和定向，三五故旧相逢，又还能相互鼓舞支持，维持了纯厚的友谊，长远不褪色走样。因此在“四人帮”一伙倒台后，就共同怀着“人间重晚晴”的心情，又复作重新拿笔准备。凡是过来人，自会理解到，提起手中这支笔，首先感到的是分量如何沉重！

我在三十年代中，对于当时报刊上那些充满新的气息有分量的通讯特写，就是个热烈爱好者。我曾在《自传》中提到，我喜欢读一本小书，同时还念念不忘那本用人事写成的大书。自从我二十岁来到大都市讨生活后，那本大书篇幅虽扩大了，但深度实大不如前，直接接触到的人事内容范围可缩小了。转到学校教书后，接触面便更缩小。深幸所在几个大学，不是汪洋万顷碧波无际的大海边，就是仿佛来自天上一泻万里的长江中游，增加了我横海扬帆的远梦。但初进大城市二十年以来，我对于当时在剧烈变动中社会人事深刻的变化，可以说是无知或所知不多，渴望从别一方面得到充实。这些从报刊中反映社会动荡的新闻特写，它们便给我许多有益补充。特别是这些作品所使用的不拘一格的表现方法和处理问题的技术，给了我不少启发和教育。三十年代前期，我写的两个叙述地方人事景物的散文小册子，就或多或少是在当时报纸上那些通讯报道特写纪事影响下完成的。我们经常听到对

于某一文学作品的赞美，说它“生活气息浓厚”。事实上三十年代以来，一些突破旧社会重重苛刻检查制度，报章上刊载的那些有内容、有分量、有褒贬的通讯特写，才真够得上这个赞许。只是照社会习惯，一般读者可极少注意这份得来不易的成就。

最近听说卧病在床的子冈，尚未恢复健康，她的新旧作品却有机会行将编辑付印。我听到这消息十分高兴，希望不久就可以读到这本书。还有徐盈同志解放前在天津《大公报》写的不少通讯报道，解放后发表的一些专题性访问文章，希望也能集印出版。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人和事，即或多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它们毕竟是历史的真实纪录。它们反映的人事和斗争，它们的写作方法和艺术成就，当时既受到广大读者欢迎，今后依旧值得借鉴参考。尽管习惯上总还认为报道特写都有个时间性，和一般文艺作品情形不同。其实真正好的有生命力的作品，不管是特写报道，还是小说诗歌，同样会起良好作用和深远影响。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大一国文课，记得当时就曾由教学会议提出两种新的措施，一是教授不分等级，都得担任一年级国文教学，便于提高同学国文基本知识。二是选定课外读物二十种，内有范长江、徐盈两位的新闻通讯新著各一册，放在最前面 表示特别值得重视。这种措施对于同学曾起过一定的好影响。这个办法据个人意见，实在还可作今后全国大专院校参考。当前主持高等教育的负责人，都是“一二九”运动的过来人，一定会比我还明白当时这些新闻通讯报告，配合学运所起的作用和贡献。

编者注：此文发表于《光明日报》一九八二年一月十七日。原副题为《子冈作品选》序，现改为《时代的回声》序。

## 跋《时代的回声》

李 庚

一九三九年秋天，在重庆山城史大姐家里，开救国会妇女界骨干的一次小会。沈兹九、曹孟君、罗叔章、张曼筠、沈粹缜几位大姐都在座。我不记得为什么事也去了，第一次见到了子冈。子冈穿一件纯黑的旗袍，罩着敞胸的大红短毛衣。强烈对比的色彩先引起我的注意，而后她在小客厅里的活跃，和我曾读过的她的几篇文章一样，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大姐们没特别为我介绍她，我当时就真感到：这是个“自己人”。

以后再没有和她来往，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新四军收复两淮，我由乡村调往淮阴城里工作。国共和谈时，在淮阴，我有时到范长江主持的《新华日报》社去，偶而也看得到过时的《大公报》。有一天，长江同志挑出两张给我看，那是登着《毛泽东先生到重庆》和《重庆四十四天的毛泽东》两篇报导的。一见文章署名子冈，我好象突然碰到熟人似的高兴。联想中，似乎看见她仍然穿着鲜红的毛衣，正在荆棘遍地的山城里，奔走采访。

一九五四年，下半年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筹办《旅行家》，经胡乔木同志建议，调来子冈担任主编。十多年后再见，子冈已经开始发胖，是个中年人了，穿的是一身有点“不修边幅”的干部服。我们交换对这份将成当时“只此一家”的旅行刊物的设想，谈得很投机。从此我们共同工作了两年多，直到五七年风云变幻的

前夕。她离开报界，那时把全身心投入编辑这本杂志，可仍然保留记者善于发现问题的“慧眼”和“反应快”的特点，对社会生活和出版社内的情况，经常敏锐地有所发现；而且立即发表意见，好象都要“马上见报”似的提出来。直到整风大字报满墙的时候，她还在“慷慨陈词”。于是一些文章和说过的话，都成了“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的证据，右派帽子理所当然扩大到她的头上。运动后期，胡耀邦同志在团中央一次小会上，转达周总理的话说：他希望这次受处分的党员能正确对待，相信大家还会回到党内来。有人却不以为然，断定“至少子冈是难得改造好的。”从另一个角度看，子冈的性格，倒也真有点“本性难移”。当我和她一起下放河北省安国县齐村劳动的那些日子，在田头地角，她还对什么“放卫星”、“吃饭不要钱”之类，心直口快地发些议论，使得有人侧目而视，有人掩耳回避。

六一年，我的户口有幸又进京以后，我决心和有些同志老死而不再往来。一下又是十年过去，完全不知道子冈是在怎样的生活了。

“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告诉我子冈身体不好，常问起我的近况。我抱着现在应当“还我自由”的心情，连忙跑去看她。还是老地点，院子虽然被人占去半边，北屋还看得出旧模样。但是迎出来的主人，已经完全是一位老太太了。她患高血压症和严重的关节炎，行走不便。曾经掌握“快笔”的手，拿起为我做菜的刀勺，动作已不利落。那次的一顿饭，是徐盈兄回家了才吃上的。后来，我常去她家，发现她说话少了，很少象过去那样议论风生、侃侃而谈。倒是在和朋友谈话中，不时回过头去，提醒徐盈填块蜂窝煤，或者要他先去买点豆制品。难道向来不善于此道，也无暇管理自己生活的子冈，变得有点象家庭妇女了？难道她的锐气已被消磨了吗？

《五十五号文件》酝酿下达之前，子冈对自己能否改正，忐忑

不安。她叹息自己和政治生活、党的工作隔绝的时间太长，怀疑自己还能再干什么。我从来不承认生活的坎坷必定要使人变成“涸辙之鲋”，彼此只能“相濡以沫”。我曾写信给她，说即使将来如何未卜，但只以她几十年的记者生涯而言，已储存下何等丰富的材料。帽子可以天外飞来，笔却终归是自己拿得住的。从各个侧面写下她经历过的事件，相信今后会有机会发表，会有它的作用。我又提起初见时她穿着红毛衣，言、动洋溢朝气的印象，说我“于君仍有厚望焉！”

我那时对她的感觉和她的自我估计，其实都并不准确，那只是一个人在压抑中的表面现象。她在骨子里，还是当年被人称为《大公报》二刚之一的子冈（另一位是杨刚同志），仍然是刚勇正直、胸无宿物的子冈。一经解脱人为的桎梏，她的本色就重新放光彩了。

一九七九年初，她的错划被改正后，青年出版社春节聚餐，她步履维艰，却是高高兴兴地走进二十年前批斗过她的大食堂，和同志们祝酒言欢，毫无芥蒂。《旅行家》恢复，开编委会她必到；稿子是成叠成堆地接受下来审阅加工；她还扶杖或借儿女臂力亲自出去约稿；她的文章又不断见报了。前年，她搭乘公共汽车，被挤撞一下，一时半身不遂，住进人民医院厕所旁不足十平方米的简陋病房。在三个病号各“陪住”、拥挤杂乱的环境里，她处之泰然，没愁自己的病，自然想着此刻对她可以说是身外之事。她思想活跃，口述由儿子城北代笔，陆续又写了好几篇文章。病并不能夺下她的笔。病榻上她口述的《汽笛》，是一篇感人的好文章，完全表现了她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我是不喜欢记住老帐的，但是我很想请那些曾经任意否定子冈是个革命者的人，也来读读《汽笛》。真正去认识一个由革命哺养、由党教育出来的老同志，她的信念和坚强，她对自己的要求和对工作的责任感——甚至一度

生命濒危之际，也至死靡他！

她以新闻报导和特写脍炙人口的时候，我正在解放区。她的好多文章没看过，我对她本人比对她的文章更熟悉。所以一提笔，便写了上面那些话，也许不是多余的。

黄伊同志让我先看了《子冈作品选》的初选稿，大约有六、七寸厚的一叠子，只是从她自抗战起至解放后写的文章中选出来的一部份，但已相当多是我不曾见过的。集中初读，特别对她在抗战时期写的东西，感受新鲜而强烈，使我得到对一位相知已久的老朋友，更加深了认识和了解后的满足。

记者不是史家，不可能系统地写“史”，她只是对此时彼时、这里那里发生的新闻（包括事件和人物）进行报导。积累下来的报纸，可以成为完整的历史资料。记者作为个人，往往只能记录下史实的一鳞半爪。但把抗战时期子冈在“大后方”写的报导、特写，搁在一起读下去，却能叫人从许多侧面看到了那个时期的部份历史面貌。从她的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爱国士兵、工人、青年、妇女和儿童的抗战热情。一篇《擦鞋童献金救国》，打动过千万个读者，从贫苦儿童的行动反映了抗战初期那种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的高涨。《毛泽东先生到重庆》，不仅给我们记下了毛主席的举止、风采、气魄，而且记录下了蒋管区人民对和平的渴望和对共产党、毛主席的忧忧热望。子冈也为我们记录了众望所归的宋庆龄当时的活动和贡献，记录了抗战时期一些知名人物的活动和重庆各阶层妇女的境遇和风貌。她记录了日本帝国主义曾如何残暴地轰炸武昌和汉阳，记录了国民党又曾如何地迫害进步力量。她也曾给我们留下了抗战中阴暗面种种的剪影，从孔二小姐的“飞机洋狗事件”到国民党官员的囤积居奇，花天酒地，都为那段历史展示了许多侧面。这些，至今还可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见证，值得年轻的朋友们也读一读。

五七年错批她的时候，有人说她“缺少政治观念”，有人说她善于把政治性降低了的社会新闻，从现在集中在我面前的文章来看，恰恰相反，子冈是很有政治眼光的。她不但抓得着重大的政治新闻，而且善于捕捉出具有强烈政治意义的社会新闻，并且能挖掘和把握住社会新闻内涵的政治性。她是个共产党员，经常生活在群众中，和周围的社会息息相通，她和人民一样关心许多抗战中的主要问题，对其种种表现十分敏感。“血管里流出来的总是血”，这正是她过去未能准确解释她自己的所谓“新闻眼”和“新闻敏感”的来由。

子冈曾被人称为大胆、果敢的女记者，这评语是不错的。早年她就敢于采访形成向国民党反动派大示威的、为鲁迅先生送葬的游行。又曾冒险进入苏州监狱，采访报导救国会七君子的被捕事件。她不怕因揭露孔二小姐的丑闻而开罪于权贵豪门，大胆地在特务横行的重庆，在报纸上热情宣称毛主席来渝“是维系中国目前及未来历史和人民幸福的一个喜讯。”她勇于表示分明的爱憎：一篇《张家口漫步》的特写，盛赞解放区实行民主、关心群众生活和开展文艺活动的新气象。另一方面，又同时在连续的“北平通讯”中，无情地揭露和斥责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子冈的报导特写，能够及时反映现实，富有战斗性，这使她当时赢得了广大的读者。

解放前的《大公报》，是一份给国民党反动派“小骂大帮忙”的报纸，这已经是历史公正的结论了。但有人把子冈上述一类文章，也看为“小骂”之列，却是完全谬误的。《大公报》当局意图以“宽容”、“开明”为自己装饰打扮，以便骗人，这确有其事，但恰恰是这个打算又形成了这份报纸给我们提供的可乘之隙，作为《大公报》记者的共产党员们，因此得以利用了一个我们自己难予提供的阵地。在白区工作，利用这种“争过来”的阵地是进行战斗的方

式之一。对这种方式的战斗，检验的尺子，只能是拿出去的东西的内容和它产生的效果。而子冈的战斗是卓有成效的。

在敌人统治的地区发表文章是很困难的，尽管子冈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员称为“不好对付的人”，她常常能够突破一些检查的铁网，但究竟是限制重重，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说，或者隐约其词，甚至于只好避开不说。有时使文章到关节之处，反而不够明朗、深刻，令人遗憾。这是当时没有办法的。读这本集子里某些文章，应该多看到它本质的内容，和当时的作用，要想到它发表时的历史、环境条件，不可以今天的眼光加以苛求，我以为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敢于触及现实和富有战斗性，这个子冈在自己的新闻工作中显示出的特点，在解放后，突出表现为鲁迅所云：为新生事物大喊大叫。她写了大量的新社会的国内外通讯。《官厅少年》，就是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的名篇。子冈这时多所歌颂，来于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也是五十年代前期蓬勃向前的中国现实的客观反映。但子冈也写了提出新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批评某种不良作风的文章。《假如我还当记者》由批评大量蔬菜烂掉迫使群众排起长蛇阵来，提出对蔬菜公司管理体制的疑问，更进而严厉指责对人民日常生活漠不关心的现象。《尊重新闻记者》尖锐批评了我们干部中已经有所发展的官气、官僚主义，高呼及时整风的必要。五七年反右，这两篇文章，被当作不分延安、西安的典型。现在也并未入选集里。我之所以提到它，是想说明，在新社会也还有为克服阴暗面的战斗。子冈这两篇文章，尽管个别意见有偏颇之处，但却也是进行战斗的正面文章，是和对新事物的报导一样，在尽着一个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的责任。

新闻报导必须尊重客观，忠于事实，首先要用事实说话。但人们还要求它有记者自己的以至于独到的见解，而且喜欢记者的